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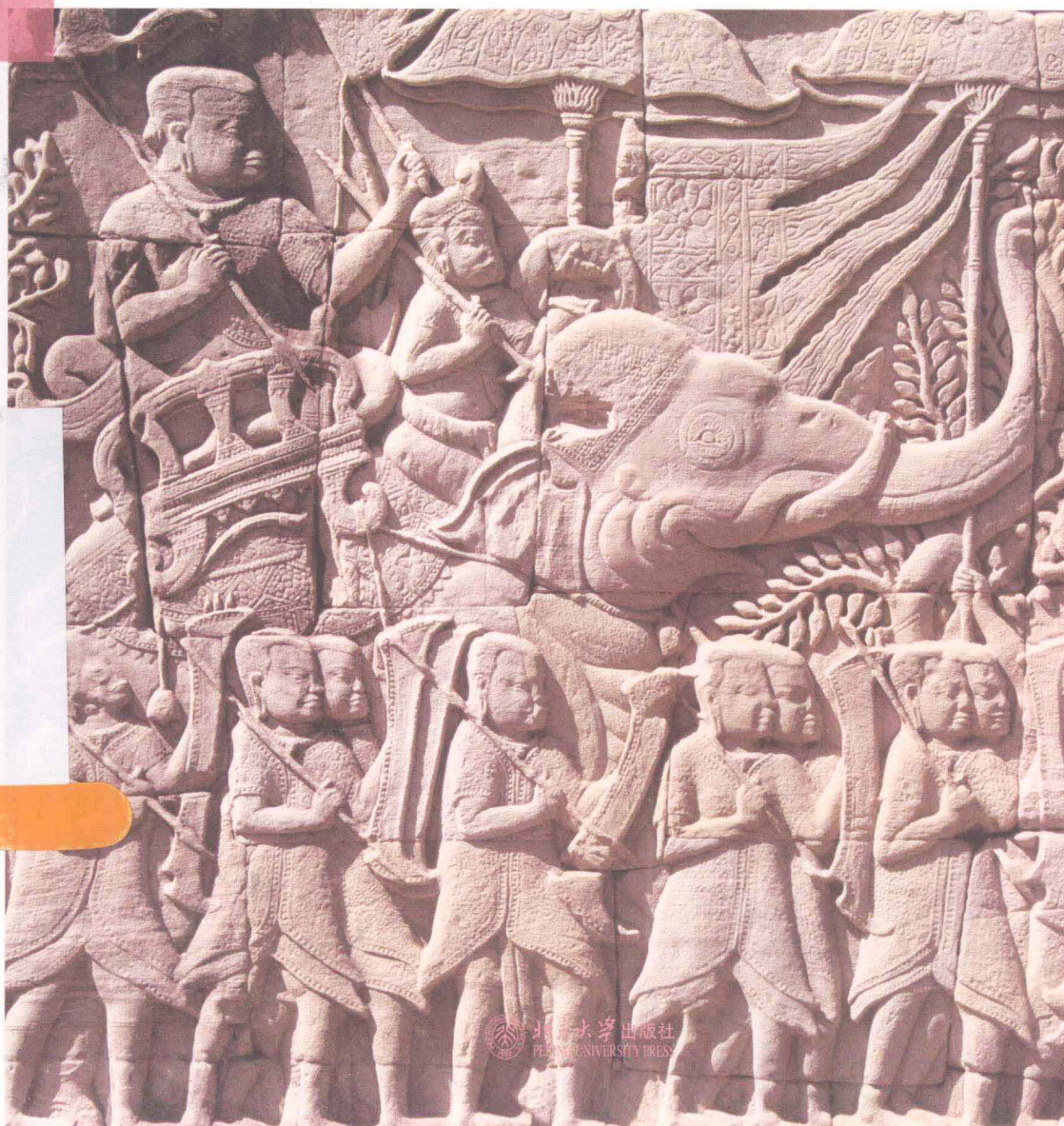
大象形象就是从印度到美洲的
文化传播的明证

大象与 民族学家

〔英〕格拉夫顿·E. 史密斯 著
孜子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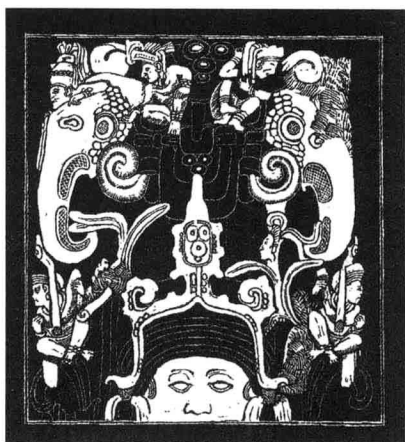
Elephant and Ethnologists

Grafton Elliot Smith



大象与 民族学家

〔英〕格拉夫顿·G.史密斯 著
孜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象与民族学家/(英)格拉夫顿·E.史密斯著;孜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沙发图书馆·星经典)

ISBN 978-7-301-22368-0

I. ①大… II. ①史… ②孜…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0610号

书 名: 大象与民族学家

著作责任者:〔英〕格拉夫顿·E.史密斯 著 孜子 译

策 划 编 辑:王立刚

责 任 编 辑:王 莹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2368-0/C·089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pkuphilo@163.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65毫米 16开本 10.75印张 108千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7.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古典人类学指近代学科发生以来（19世纪中叶）出现的最早论述类型；就特征而论，它大致相继表现为进化论与传播论，前者考察人文世界的总体历史，主张这一历史是“进化”的，文明是随时间的顺序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后者叙述人文世界各局部的历史地理关系，视今日文化为古代文明之滥觞。

“古典时期”，人类学家广搜民族学、考古学与古典学资料，心灵穿梭于古今之间，致力于解释改变人文世界“原始面目”的因由，他们组成了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一代风骚。

古典人类学家抱持远大理想，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与局部进行了历史与关系的大胆探索。

兴许由于理想过于远大，古典人类学家的探索有时不免流于想象，这就使后世学者有了机会，“以己之长攻其所短”。

20世纪初，几乎只相信直接观感的人类学类型出现于西学中，这

一人类学类型强调学者个人的耳闻目见，引申实验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于微型区域的“隔离状”的研究中。

这一学术类型被称为“现代派”。

现代派并非铁板一块。虽则现代派崇尚的民族志基本依据对所谓“原始社会”与“乡民社会”的“田野工作”而写，但学者在分析和书写过程中所用之概念，情愿或不情愿地因袭了欧洲上古史既已形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曾在古典人类学中被视作认识的“客体”得到过考察。另外，在现代派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诸如法国社会学派的比较之作，及美国人类学派的历史之作，都更自觉地保留着浓厚的古典学派风范，刻意将观察与历史相结合。

然而，现代派的确使民族志方法流行起来，这使多数人类学叙述空前地注重小写的“人”，使其制作之文本愈加接近“普通人生活”的复述。此阶段，“直接观察”、“第一手资料”的“民族志”渐渐疏远了本来富有神话、宇宙论与历史想象力的大写的“人”的世界。

现代派“淡然”远离人文世界渊源与关系领域研究。这一做派到1950年代至1980年代得到过反思。此间出现的新进化论派、新世界史学派及新文化论派，局部恢复了古典派的“名誉”。

可是不久，这个承前启后的学术“过渡阶段”迅即为一股“洪流”冲淡。后现代主义给人类学带来“话语”、“表征”、“实践”、“日常生活”、“权力”等等诱人的概念，这些概念原本针对现代派而来，并偶尔表现出对于此前那个“过渡阶段”之成果的肯定，然其“总体效果”却是对于现代派“大历史”进行否定的新变相（也因此，后现代



主义迅即被众多“全球化”的宏大叙述替代，并非事出偶然）。

当下西学似乎处于这样一个年代——学术的进步举步维艰，而学者的“创造力自负”和“认识革命迷信”依然如故。

在中国学界，古典人类学也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

进化论思想曾（直接或间接）冲击清末的社会思想，并于20世纪初经由“本土化”造就一种“新史学”，对中国民族的“自传”叙述产生深刻影响。接着，传播论在清末以来的文化寻根运动及19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的民族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西学中出現现代派不久，1930年代，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同样地随之出现了建立现代派的运动，这一运动之一大局部，视现代派民族志方法为“学术原则”，对古典派冷眼相看。与此同时，本青睐传播论的中国民族学派，也悄然将以跨文明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传播论，改造为以华夏古史框架内各“民族”之由来及“夷夏”关系之民族史论述为主干的“民族学”。

“中国式”的社会科学“务实论”与历史民族学“根基论”，消化了古典人类学，使学术逐步适应国族建设的需要。

1950年代之后，古典人类学进化论的某一方面，经由苏联再度传入，但此时，它多半已从学理转变为教条。

而学科重建（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再度进入一个“务实论”与“根基论”并重的阶段，一方面纠正1950年代出现的教条化失误，一方面复归20世纪上半期学术的旧貌。

学术的文化矛盾充斥于我们亲手营造的“新世界”——无论这是

指世界的哪个方位。在这一“新世界”，搜寻古典人类学之旧著，若干“意外发现”浮现在我们眼前。

经典中众多观点时常浮现于国内外相关思想与学术之作，而它们在当下西学中若不是被武断地当作“反面教材”提及，便是被当作“死了的理论”处置，即使是在个别怀有“理解”旧作的心境的作者中，“理解”的表达，也极端“谨慎”。

而在今日中国之学界，学术风气在大抵靠近西学之同时，亦存在一个“额外现象”——虽诸多经典对前辈之“国学”与社会科学论著以至某些重要阶段的意识形态有过深刻影响，又时常被后世用来“装饰”学术论著的“门面”，但其引据对原版语焉未详，中文版又告之阙如（我们常误以为中文世界缺乏的，乃是新近之西学论著，而就人类学而论，它真正缺乏的，竟是曾经深刻影响国人心灵的原典之译本）。

文明若无前世，焉有今生？学术若无前人，焉有来者？

借助古典派（以及传承古典派风范的部分现代派）重归人文世界时空之旅，对于企求定位自身世界身份的任何社会——尤其是我们这个曾经有过自己的“天下”的社会——而论，意义不言而喻。

译述古典派论著，对于纠正“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学术作真正的积累，造就一个真正的“中文学术世界”，意义更加显然。

王铭铭

2012年9月29日

译者序



《大象与民族学家》的作者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是流行于20世纪初的超级传播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871年生于澳大利亚，1937年卒于英国，从悉尼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即定居英国，直到逝世。史密斯在英国成为神经解剖学和人类史前史的权威，也是著名的埃及学家和人类学家，并获封爵士。他作品丰富，涉猎领域广泛，最为世人所熟悉的要算他的文化传播理论，而他有关古埃及为人类史前文明主要源泉的理论则最富争议性。此外，在今天医学领域灵长类大脑进化理论中，他仍占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在文化方面，他著述丰厚，主要作品有《人类史》（已在国内翻译出版），《龙的演变》《大象与民族学家》《文化的传播》《古代埃及人及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论木乃伊制作地理分布的意义》《图坦卡蒙及发现图坦卡蒙墓》等等。《大象与民族学家》是史密斯文化传播理论的重要作品，也是世界文化传播理论的经典之作。书中

主要关注印度文明和美洲玛雅文明，但几乎涉及了各个主要文明，以及包括北欧、西欧、东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区的亚文化，涵盖的领域跨越历史、考古、神话、宗教信仰与习俗、建筑、雕刻艺术等。作者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由此可见一斑。

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象与民族学家》，堪称人类学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主要探讨美洲玛雅文明起源的问题及相关的文化传播。作者认为，美洲玛雅文明并非美洲的原创，而是在自西向东发生的文化传播的影响下形成的：公元后的大约1200年间，或比这一时间再早二三百年开始至公元后12世纪这一期间，印度文化如何经由中南半岛、太平洋，持续不断地传播到美洲，并影响了美洲古代文明的形成，使美洲文明具有的鲜明特征打着明显的印度烙印。作者通过比较神话传说、各自信奉的主要神灵及呈现出的艺术形象、习俗、雕刻与装饰艺术等等，进一步证明受到印度文明影响极深的中南半岛（即书中所说的印度支那）乃美洲玛雅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而且中南半岛影响美洲文明的时间主要在公元5至12世纪期间。

作者从出现在古代美洲玛雅文化遗址科潘的石碑所雕刻的动物是否为印度大象开始展开讨论，并认为，这一雕刻显然表现的是印度大象而不是如其他学派所认为的生长在美洲的金刚鹦鹉，而且装饰细节如象夫、缠头等也具有显著的印度特征；而相似的大象形象不仅出现在石雕上、象形文字上，还出现在美洲人的手抄本，即玛雅人留给后世的文字。在作者看来，印度大象的艺术形象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非常之广，不仅在印度及中南半岛非常普遍，还向西传到欧洲，向东传



到中国、日本，而作者认为，印度大象形象传播所至的最远端非美洲莫属。当然，在传播过程中，大象的形象有了变化，而且越发失真。另外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动物形象为虚构的动物龙，各个古代文明中，对龙这一动物的叫法或有差异——或被称为龙，或摩伽罗（Makara，即摩羯）、神鳄、迹、西佩克特利（Cipactli）等，而且其形象也或多或少有不同之处，但相似之处也颇多。

作者从大象雕像转向讨论大象在印度作为神的坐骑及神形象的一部分的特殊象征意义，进而联系到与大象密切相关的印度吠陀时期最主要的神灵之一因陀罗，认为，因陀罗是美洲玛雅恰克神（Chac）和墨西哥特拉洛克神（Tlaloc）的原型。与其有关的传说、信仰，其形象及标志物，其动物坐骑等，以相似的形式出现在美洲。而且，随着对因陀罗的崇拜传播到美洲的还有对其他印度神灵的崇拜，而由于这些神灵在印度时相互就有着复杂的关系，多有被混淆的情况发生，所以传播到美洲后，甚至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

在作者看来，世界各主要神话有着相似之处，如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关于蛇的故事等。作者认为，由于印度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甚至希腊文明的影响，这些影响留下的痕迹显然经由中南半岛反映到了美洲文明中。印度文化向美洲传播的途中，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中间地带发生的变化也随之而至，最终所有这些元素都被融入了美洲文化中，当然，最显著的，当属中南半岛对美洲的影响。在持该观点的同时，作者并不否认本土智慧在美洲文明形成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有趣的是，作者认

为中国文明也对美洲产生过影响，他认为这一影响也经由柬埔寨传入美洲，所以美洲文明中也含有些许中国文明的元素。

作者的上述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掀起了惊天巨浪，尤其遭到美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与抨击，因为他们认为美洲文明是在无外来因素影响下由美洲人独立创造的。

该书成书于20世纪初，那时关于美洲的考古发现有限，对玛雅象形文字的破译还处于初级阶段，无甚进展，对美洲玛雅历史的年代考证也较为有限，但作者借助于印度、柬埔寨、波利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已确定的历史，并通过考证太平洋两岸的建筑、雕刻艺术、宗教信仰与习俗，对文化向美洲的传播及时间做出推测论证。作者尤其认为柬埔寨在美洲文明起源研究方面是个鲜活的例子，他认为，对柬埔寨历史更多的了解，将有助于回答美洲文明起源的问题。本书的出版距今虽已近百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和研究方法，尤其借助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手段，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作为人类学和学术研究门外汉的我，能承担并最终翻译完成这样一位博学多闻的著名学者的重要作品，首先要感谢王铭铭教授对书目的筛选，还有对我本人的鼓励。这对我个人不仅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也让我感觉并没有完全虚度时日。在跟钱打交道的“世俗”领域摸爬滚打十几年后，迫于身体原因，闲居在家，虽然对文化与历史一直情有独钟，对翻译也有一定的掌握能力，但翻译这部作品对我无疑也是很大的挑战。阅读和查阅资料的工作开始于2010年的3月，至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主要还是因为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无法



过多，好在我基本坚持每天做一些，所以，最终能完成《大象与民族学家》的翻译并看到本书付梓出版，我自然无比欣慰。欣慰之余，对翻译水平及行文的担忧不减丝毫。还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此刻，心中最感激的，莫过于家人对我的爱。

译者

2012年4月20日

前言



人类初习绘画或制作塑像之初，在选择艺术创作对象时，对大象和其他长鼻目动物总有着奇怪的迷恋之情。发现于法国的穴居遗址及其他旧石器时代居住遗址中，我们人类的祖先智人留下了他们的艺术作品，其中许多为大象和猛犸象的绘画和塑像作品。这些早期遗址分布区域甚广，不仅出现在法国，还出现在从西班牙到摩拉维亚*的大片区域。而在古代埃及和古巴比伦，及晚些时间的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亚，也有作品偶尔表现大象的形象。但是，文化的传播将印度的习俗与信仰带到了遥远的地方，使不为当地熟悉的大象这种哺乳动物受到广泛喜爱，喜爱程度堪与印度媲美。

如果先来介绍一下我在什么情境下开始写作本书，或许最能解释

* 译者注：摩拉维亚为今天捷克东部的一个地区。

** 译者注：即今天的中南半岛。

清楚本书的目的及讨论范围了。

1910至1915年间的诸多考察研究使我确信，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的美洲文明，并非完全由墨西哥、中美洲及秘鲁的原著民独立创造，美洲文明的灵感主要受到公元年开始后或者可能早至公元前二三世纪开始的1200年间，陆陆续续越过太平洋来此的外来移民的激发。这些移民在不同时期越过太平洋，定居在洪都拉斯（参见地图上的科潘，即COPAN）及其他地区。通过这些移民，旧世界文化（其呈现的特征让人想到柬埔寨文化，参见地图上标为C的地方）的种子，在新世界生根发芽，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形成了新世界特有的文化。

在我的拙著《古代埃及人》^[1]第2版出版时，我讲述了促使我持这一观点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已过世的里弗斯（W. H. R. Rivers）博士和佩里（W. J. Perry）先生在这一新理论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里弗斯博士在他的民族志作品《心理学与政治学》^[2]中讲到了这一新理论；而佩里先生在他的《印度尼西亚的巨石文化》^[3]及《太阳的孩子》^[4]两部著作中亦从他的视角对该理论进行了论述。1915年，我们三人一致认定，前哥伦布美洲文明建立在通过太平洋传播而至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上的历史事实，不容再有质疑。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一理

[1] *The Ancient Egyptians*, 1923.

[2]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1922, pp. 109-137.

[3] *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Indonesia*, 1918.

[4]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1923.



文化传播的几条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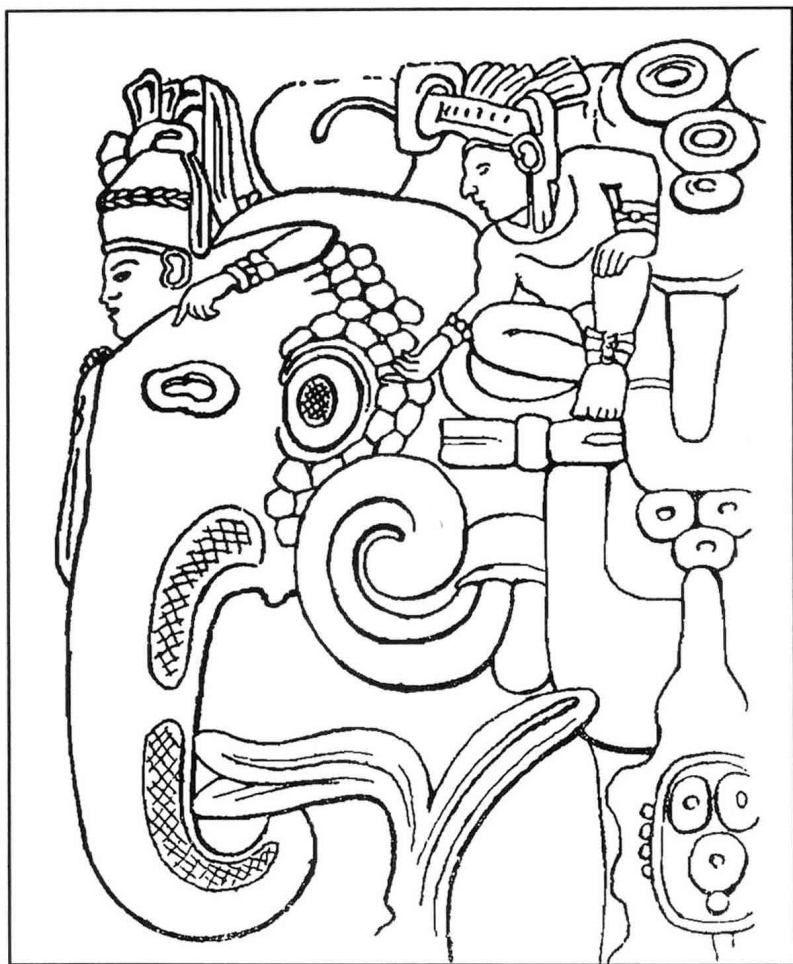
主要路线是从柬埔寨（图中以C表示）出发途经密克罗尼西亚（以Mi标示）抵达中美洲（科潘）。美洲文化中的美拉尼西亚元素，部分通过美拉尼西亚连接密克罗尼西亚的路线传播，部分则通过太平洋南部路线（波利尼西亚）传播。印度文化通过海、陆两路对柬埔寨的影响在图中以箭头标出。中国文化对柬埔寨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的影响也在图中予以标明。

论遭到了狂轰滥炸般的反对，其中较普遍的反对意见是，这一理论涉及领域众多，而证据的收集又如此艰巨，展开任何有意义的讨论实在不可能——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年代离质疑达尔文的理论已长达半个世纪，我不得不说这是个很奇怪的借口！

1915年的大英人类学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曼彻斯特会议上，尽管我们为自己所持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驳辩，但事后看来，似乎集中就其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更为可取，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各种根深蒂固的批评。所以，我决定给《自然》（*Nature*）杂志写封信。这封信发表在1915年11月25日的《自然》杂志（340页）上。信中，我提醒大家关注这一事实，即：工匠在洪都拉斯境内科潘遗址的一个石碑上所雕刻的，明显是一头印度大象，大象上坐着一样具有印度特色、戴着缠头的象夫，而这一雕像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发开始其发现新世界航程的几个世纪前完成的。

上述观点引出了一个问题，而最终若能为这一问题找到正确的答案，意义将何其深远。此外，这一观点使我的批评者们无法用他们惯常的理由来批评我。譬如说，即便是“人类大脑思维相似”理论最狂热、最具想象力的信奉者，也无法说服明辨是非懂得道理的人，美洲所发现的印度大象及戴缠头的象夫的形象完全由从未见过大象的美洲土著人创作。另外，将埃及因素从这一文化传播理论的具体案例中剔除出去，即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印度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可以让我们搁置令人困扰而且已经明显阻碍深入讨论的展开的元素。

信奉美洲文化的发展过程未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民族学门罗



在科潘发现的古代美洲石碑（“B号石碑”）上雕刻的画

对该画展开讨论便是本书的内容之一。我在书中所持观点为：该石碑雕刻的是一头印度大象，上面坐着戴缠头的象夫，而雕刻此作品的工匠虽从未见过大象，却明显在模仿外来的大象形象。这幅插图是莫兹利（Maudslay）作品的复制品。莫兹利认为该石碑雕刻的是獏这种动物。